

新文學選集第一輯

洪雲蘇熙選集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開明書店出版

新文選集

洪靈菲選集

開明書店

洪靈菲選集
[乙種本]

每冊定價 8,100 元

32 開本 216 定價頁

| | | | |
|-----|------------------------------------|---|---|
| 著者 | 洪 | 靈 | 菲 |
| 編輯者 |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 | |
| 主編 | 茅 | 盾 | |
| 出版者 | 開 | 明 | 書 |
| |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 號) | | |
| 印刷者 | 科學技術出版社印刷廠 | | |
| 發行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 |

1951 年 7 月初版

分類 12 書號 8857(購)

1952 年 9 月乙種本初版(1—4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一五四〇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選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學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又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 北京

我所知道的靈菲

孟超

我認識靈菲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那時正是大革命退潮之後，革命勢力退出武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了南昌暴動，部隊進入潮汕，發動了廣州暴動，黨的活動便轉向地下，反革命的劊子手們雖然到處加緊進行着殘酷的白色恐怖，但許多革命工作者對於他們的回答，卻是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和繼續搏鬥的事實。而我們這一羣，抱着同樣的心情，從不同的戰場上，從不同的省分裏，冒着追捕、殺害的種種危險，聚集到了上海，在新的革命工作的要求之下，尋取了另一種鬥爭方式，用筆的武器，開始建立了階級文學的新的陣地。當時，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經在武漢醞釀過的文藝團體，正式組織成了太陽社，創辦了太陽月刊；靈菲，平萬，還有杜老國庠（那時他化名林伯修），組織了我們社，出版了我們月刊。這兩個團體，這兩個刊物，雖然對外是各自獨立着，其實在同一目標之下，不但步調一致，慢慢的兩個組織也由二化一了。

我還記得和他最初的見面，是在北四川路底橫浜橋口一家極小的廣東館子裏，我和阿英在那裏吃最廉價的包飯，他和平萬，杜老也常常在另一個桌上出現。這個飯館客人並不

太多，每次相遇，從神態中，從談話的口風中，彼此是早已默認了，但開始接談，還是經過了郁達夫的介紹。他把大家拉攏到一個桌上，幾杯白酒，一場熱烈的敘話，從此就恍如多年的舊交。不過，靈菲平常總是謹慎沈默，不多發言，雖然也有感情激越的時候，只不過高笑幾聲，一剎又恢復到寧靜，特別是對於他過往的事跡，更是很少敘述。現在時間相隔已經二十幾年了，每次回想舊事，雖然他那瘦削清瘦的身影，他那誠摯熱情的神態，往往就自然湧上眼前；而關於他的出身經歷，以及怎樣的走上革命的道路，總覺得知道的實在不夠詳細，難以整理出個頭緒。

據我僅能憶及的，他是廣東潮州人，曾經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這個學校便是後來的中山大學。當他還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正是南中國革命潮流高張的期間。他在中國共產黨最初運用統一戰線政策而獲得成功的國共合作政治局面下，開始參加了學生運動，參加了當時屬於國民黨左派的組織，更由此接近了馬列主義，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他曾在沙基慘案反帝鬥爭中，做過不少的組織與宣傳的工作；他也會親眼看見過中山艦事變的發生，看見過北伐，以至於蔣介石的叛變革命和屠殺革命力量。蕭楚女、張太雷以及許多死難烈士的斑斑的血跡，更培養了他，教育了他，使他愈加堅強起來。由於事變之前他曾工作在廣東政府海外部，兼作着黨的支部工作，早已被反動派所嫉視，事變以後，就被通

緝，幾次受追捕搜查，有一次躲到尼姑庵的棺材房裏才幸免於難。這樣，他成了奔波流亡的逋逃者，流浪到新嘉坡，流浪到暹羅。雖然無時無地忘記過革命事業，但無處可以容身。最後，乃決然到了上海，我們的相識正是在他流亡之後。

我還記得在一個寒風颶厲霜雪逼人的晚上，在他住的亭子間裏，我們兩個人瑟縮地坐在沒有熱氣的火鉢旁邊。嚴酷的時令正象徵着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他卻忽然的把平時冷靜沈鬱的心的幔幕揭開，露出了內蓄着的狂燒着的热情，高聲朗誦李白的詩，杜甫的詩，拜命，雪萊的詩，用長歌狂嘯抒發盡了久壓的淤積。自然，曾經度過二七年代的革命浪潮的人，誰也會知道那時革命青年中是有不少的人存在着兩種互相矛盾的感情生活，一面是嚴肅的工作，堅韌的精神；另一面就是浪漫譎克的氣質和行動。當然，這還是由於革命知識分子的階級性的限制。但這表現在靈菲身上，卻顯得極不調和，因為他的誠樸謙虛使人難於想像到他的豪放疏狂。這樣，使我不能不笑着向他說：「你具有純厚的，不加雕琢的農民的性格，同時也具有放浪形骸的詩人士大夫的性格。」他聽了我這話，沈了一沈，收斂了那激發的感情，慢慢的告訴了我他的身世。

他出身在一個貧苦破落的家庭中。他的父親是落第秀才，最初靠了課蒙爲生，後來轉業中醫。他從小就長養在農村裏邊，得到了土地的培育，也沾染了土地的氣息。家業中父

母、弟兄、姊妹七八口之多，主要的依賴了他父親不足五十元的收入，來維持全年的生計。他告訴我說：從出世長到十五歲，還沒有嘗到雞蛋是甚麼滋味。他五六歲的時候，就已經參加了家庭的勞動工作。每天，天還不亮，雞剛叫過，就同姊姊弟弟拿着弔箕鐵鉤，到村巷裏，檢拾豬糞、蔗渣；豬糞檢來做肥料，蔗渣檢來當柴燒。在農村裏，窮苦人家的孩子們都做這些勞動，然而卻被富人家孩子瞧不起，對他掩鼻而過，加以卑視的白眼，甚至於迎面向他額角上吐上兩口唾沫。這樣，貧與富的階級間的不平的思想，在他幼小的年代早已插下根，種下了仇恨的苗。自然在當時他只能背地裏偷哭，向着爸爸媽媽申訴，而能夠得到的安慰，也僅僅是「孩子，等你長大成人，有了出息就好了。」這是媽媽的話。至於嚴厲的父親，就連這點都沒有，除了要求他「上進」之外，只有對他的苛責了。

他縷縷的敍述着這些童年的瑣事，窗外呼呼的北風，似給他做着憂鬱的伴奏；然而，他的話卻又從低沈轉到了激昂：「有出息」，「上進」，全是空話，現在我早已明白了這些社會制度造成的罪惡，只有用革命來解決的。」這些故事給我以啓示，使我更進一步知道他與革命的結合，固然由於時代所造成，而他的家庭，他的出身，幾乎使他具備了先天的革命的條件的。

在那時，靈菲慣說的一句話是：「革命運動雖然受到暫時的挫折，但我們有一枝筆，就

會使他從另一方面蓬勃起來的！」是的，當時革命文學運動的確是有了極大的開展。從事這一運動的，由各地匯集到了上海，得到黨的指導，特別是秋白同志，更是重視這一工作。在我們這一小部分中，又推他是最勤奮最辛勞的一個。他從那時起，編輯着我們月刊之外，一連串的寫了不少的小說，印成單行本的，有流亡、前線、轉變、明朝、氣力出賣者、家信、長征、歸家等；其他短篇的文藝論文，除了發表在我們月刊，也散見於其他刊物，如太陽、海燕、拓荒者、海風週報、大眾文藝、文藝講座等；翻譯方面，他譯過高爾基的我的童年、賭徒等。不過，不久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極殘暴的文化壓迫，許多進步書店遭了封閉，書籍刊物也都受了查禁，因此他的作品多半不能公開發售，甚至還有一部分剛印出來的，也失掉與讀者見面的機緣。而他自己在這種環境之下，爲了避免反動檢查機關的注意，有不少的文章是用了林曼青、林蔭南、李鐵郎……等筆名發表的。所以他的作品散佚特多，不易搜集，有的流落在書攤書肆，由於署着生疏的名子，也容易被人忽略過去。我常常想到他的作品正如他一生所遭受的一樣，頗沛困厄，以至於屍骨都失掉了着落。正因這樣，使我們更不能不就指着那曾經橫暴一時而現在遁處臺灣託庇於美帝國主義仍在進行賣國活動的蔣介石匪徒和他那反動殘餘力量，而永無消解仇恨的一天！

在這裏，讓我順便略談一談羅非的小說，特別是作爲選品的這一部流亡。這是他最初

的作品，自然這裏邊所表現的，只是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如果我們拿二十年後現在的尺度去衡量它，也許會感到不夠完整，不夠精鍊，或者與今天的要求不能完全契合。然而追溯起來，從革命文學的發展階段上看，那是正在開創的初期，這作品卻已經能夠表現了那一時代，並且代表了當時的情調風格等等，這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正因為這個原因，貫串在整個流亡中的，一方面不免是以感情去接觸革命，另一方面又不免是抽象的表現了革命的概念。他以浪漫主義的表現方法，在革命的故事中揉雜了不少的戀愛場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在風格上是受了郁達夫的影響（自然他沒有郁達夫的頹廢的一面）。可是，我們更應該着重的指出：他不但是忠實的反映出在革命低潮中革命青年由各種苦悶而轉到反抗的歷史事實，同時，並以憤慨的熱情，恣肆的筆力，對於那黑暗的政治，黑暗的社會，以及屠夫劊子手的瘋狂的壓迫與虐殺，加以無情的暴露，進一步的指出革命才是唯一出路，這樣鼓舞了廣大青年，教育了廣大青年。因此，他對青年起了一定的影響，對革命運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我們應該公正的從這一角度去估定他的價值。

在那時候，靈菲除了寫作之外，還在中華藝術大學擔任着課程，教的大約是「文學概論」「小說作法」之類。中華藝術大學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對知識分子作宣傳教育工作的進步學校，他在那裏也是爲了革命工作，而不僅是簡單的教書生活。不過，這學校也正如

那時其他公開的左翼文化活動一樣，不久也遭了封閉。一九三〇年「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成立，他在發起時就是組織成員之一。以後，他也曾參與過「文總」（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的主要工作。

爲了黨的需要，他也會暫時離開了文藝活動，而參加了更重要的黨內或其他工作，他作過滬西區委的工作，江蘇省委宣傳部的工作，比較時間長久的，是全國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這一團體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全國進步力量因憤於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而組織的，它比較有廣泛的羣衆基礎，對於革命運動曾起過不小的作用。靈菲一直在裏面擔任着主要的領導工作。他通過羣衆路線，把黨的政策實現出來，更把這團體的原有的知識分子的組織基礎推廣到工人羣衆中間。他辦了不少的工人夜校，他在這些夜校裏都是親自主持，或者親自上課，因爲夜校工作走上軌道，自然會成爲工人運動的有力的輔助。

在這一個時期，因爲我們工作不同的關係，便很少和他會面了，但偶爾遇見，或者特爲約一個時間敍一敍的時候，我總感覺到他是比以前進步了很多。他更加堅實，更加沈着，雖然熱情還依然內蓄着，浪漫譯克的鋒芒卻已經收斂了不少。我問他：「還常常寫東西不？」他總說：「那裏有那末多空餘的時間。」再問他：「還喜歡讀李白，杜甫，拜倫，雪萊的詩不？」他笑了，緊接着便轉到他的工作上，告訴了我許多工作中的實際情況，或者革命中

的一些原則問題，依然還是那末娓娓不倦的，可是從高談闊論，慷慨激昂，變成了思慮深沈，着重剖析了。他從前還只是一個帶有革命氣質的詩人，而現在是保持了固有樸質的一方面，苗實的更提高了一步。我知道這是由於工作中的鍊鍊，磨去了舊知識分子從階級出身中帶來的弱點，他是真正的成爲一個完整的布爾什維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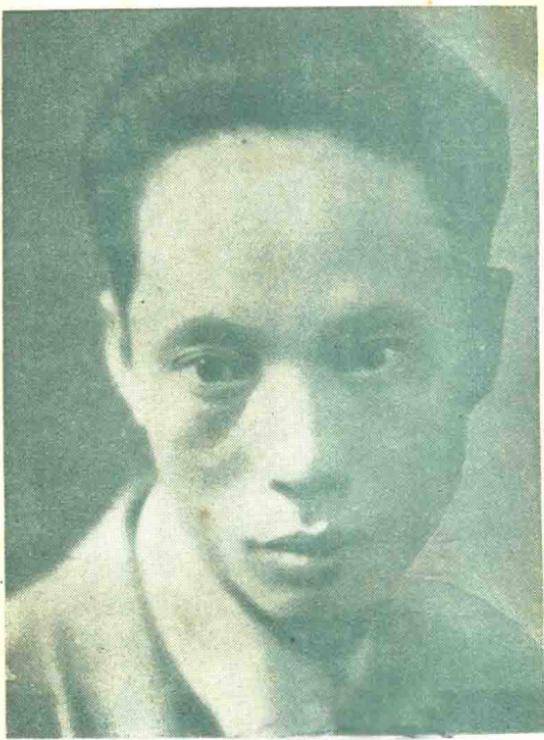
自從「一二八」上海戰事之後，不久我入了獄，從此再也沒有看見他。

關於他就義的事實，是以後從他愛人秦靜那裏聽來的。據說在一九三三年春，黨中央把他從上海調到北京，大約擔任秘書之類的工作。他爲了掩護自己起見，表面上還是以作家身分出現的。當時工作可能不很忙碌，他在工作之餘，又重新開始了一段寫作生活——自然主要的還是黨的工作——而且事實上已經着手寫長篇小說《童年》。這僅僅寫好三章的未完成的作品也終於隨着他的不幸而遭到了毀棄。他在北京住了不到半年就被捕了，日期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地點是在宣武門外李大釗同志的姪女家裏，曾被密禁在皇城根大公王府國民黨憲兵第三團。不久，秦靜也在火車站被叛徒釘梢逮捕，同押在一處。特務和叛徒曾經對他用盡了各種的威脅和利誘，企圖從他身上找到黨在北京的組織線索，但他對於一切的回答，只有堅決的拒絕，終於英勇的爲革命而犧牲。他就義的日期已不可考；死後，埋屍何處，更無人得知。沒有墳墓，沒有紀念碑，然而他是和一切的烈士共同的用了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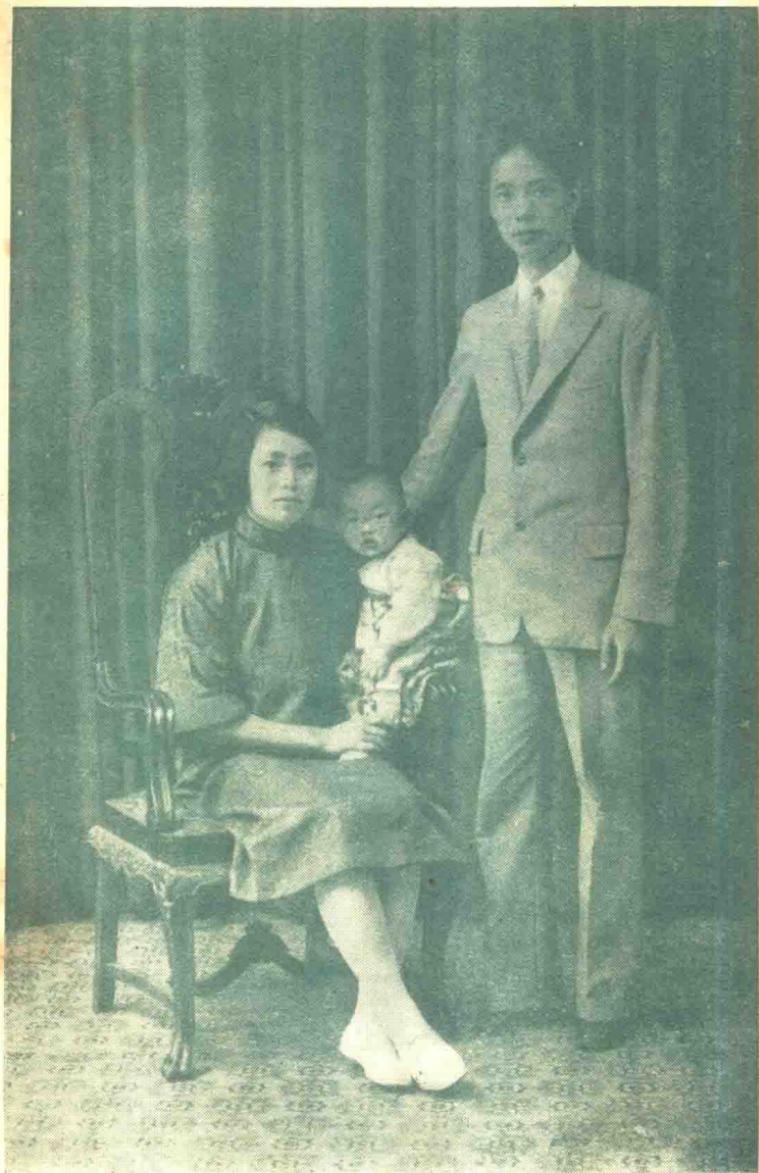
與生命的累積，做了今天光輝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石——堅強而有力的奠基石。他的不朽，是有無形的墳墓，無形的紀念碑，超於形式之外的精神感召力，永遠深藏在人民心裏的。

關於他死的情形，秦靜在羈押時，曾聽見一個憲兵向她說過，特務叛徒爲了使他生命受到最後的磨折，把他絞刑架上鬆鬆緊緊的絞，他呻吟達一小時之久方始氣絕，但至死是不屈不撓的。

寫到這裏，我聯想到尤利烏斯·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靈菲的死，早於這位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和捷克愛國者十年（伏契克被希特勒匪幫殺死於一九四三年）。伏契克說：「我愛生活，並且爲着它的美而去戰鬥。……我爲歡樂而生，爲歡樂而死，在我墳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兒是不公正的。」我相信靈菲是一樣的抱着英勇樂觀的心情而從容就義的。那末，我也應該用伏契克的另一句話來紀念他：「爲他而驕傲吧，像爲一個爲着未來而生活過的偉人而驕傲一樣！」



洪 菲 先 生 邏 像
(一九二九年攝)



一九二九年與家屬合影

目 次

編輯凡例

我所知道的靈菲

流亡

孟超

5